

書評

《東海大學圖書館藏普通本線裝書目經部附書影暨索引》校讀記

郭明芳*

《東海大學圖書館藏普通本線裝書目經部附書影暨索引》(臺中市西屯區：該館，2020年3月，內文或簡稱「普經目」)於今年三月中梓行出版，象徵著該館古籍整理最後一塊拼圖即將完成。東海大學自成立以來，即積極蒐購古籍，館藏書目之編計有三次：第一次為民國四十九至五十一年間編纂的《古籍簡明書目》與《線裝書目續編》。第二次則為民國五十九年前後與島內幾家典藏古籍院館學校合作，分別出版有《善本書目》與《普通本線裝書目》。第三次則為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先後出版有「和刻本漢籍」¹、善本書與戴君仁、周法高、李田意、方師鐸與徐復觀等人的專藏書目²。現普通本線裝書目經部的出版，可說是館藏古籍整理正邁向最後一哩路。

筆者以為古籍整理是世代大工程，透過每一世代將館藏古籍底細摸清，清楚還原其版刻時間等資料，以作為古籍保護並據以提供更多參考，而非僅僅編製書目、應付了事。東海館藏古籍書目亦邁向第三次的整理，這樣精神讓人感到無比敬佩。

《普經目》的出版，筆者認為東海館主事者功不可沒。現今藏古籍的圖書館或博物館多不重視館藏古籍的再整理與書目增訂，東海館雖是小館，在經費有限下，仍願支持館藏古籍整理與增訂。這不僅是對館藏的總整理、以服務更多人，更是重視傳統文化保護與推廣的表現。其次，編者陳惠美、謝鶯興兩位老師仍能廿年間持續不斷投身館藏古籍整理事業，其用心更使人感佩。兩位老師自本科至研究所皆東海校友，以校友

* 東吳大學中文博士。

¹ 原書名僅作「和刻本」，為更精確敘述，筆者遂以「和刻本漢籍」名之。按，「和刻本漢籍」或稱「日本漢籍」，「漢籍」二字不可省，蓋「和刻本」即日本刻本，又可細分「和書」（日人稱「國書」，即日人日文著述）與「漢籍」（又可再細分「漢籍」與「準漢籍」）。長澤書名即稱「和刻本漢籍」者即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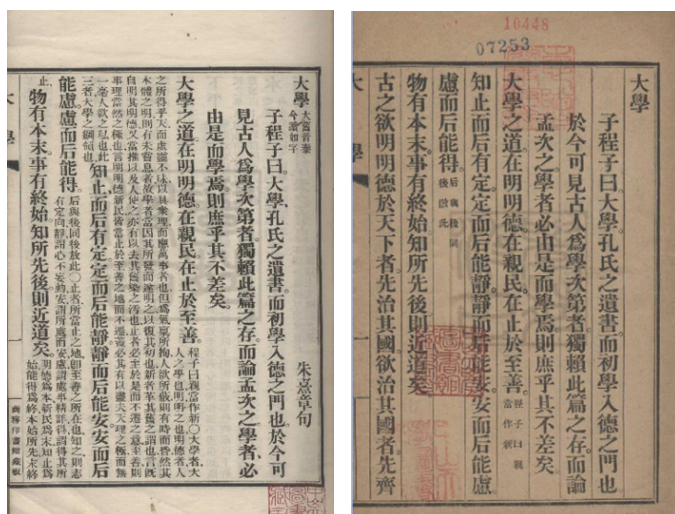
² 張學良將軍贈書部分已整理，但尚未出版專書

力量，貢獻所學，誠然是對母校的培育的反饋。

本書書名稱「普通本線裝書」，何謂也？一般來說，中國古籍區分為「善本」與「普通本」，蓋其以時間遠近為斷。昌彼得以為清初以前（含）以及若干清中葉罕見刊本、稿本或批校本劃歸善本外，餘均屬普通本。當然，比較一般的認知多以清乾隆六十年為界。在今日隨時間推移，古籍日益稀少，善本的斷限自然越往後延，一般多以 1911（清宣統三）年為斷，均稱「古籍善本」。館藏普通本的整理，按四部次序，先發表於《館刊》，待整理一段後再集結出版，現正進行史部書的整理。普通本整理之難，一在大多數館藏多未經整理，沒有更多材料提供參考。其次，由於距離較近，多不受學者專家重視，以致文獻散失嚴重。因此，在整理時吾人對相關刊刻資料缺乏，造成不少判定失準，而倍感吃力。

本書經部之成，除對館藏有進一步清理，糾正舊《目》訛誤外，同時也對學界提供不少研究訊息。對舊《目》的釐訂，如「《經籍纂詁》十二冊」（第 182 頁），原著錄「清光緒間上海瑞文樓影印本」，今改更訂為「清光緒年間上海鴻章書局石印、上海文瑞樓發行」（第 182 頁）。

又「《大學中庸白文》二卷一冊」（第 149 頁）著錄「民國間商務印書館活字本」，內文敘述卷末廣告葉無可資證明刊印時間。按，此書僅見廣州中大藏，似僅《大學》、《中庸》二種。



清末民國商務印書館刊行《大學》二種（右與東海館藏同）版式書影

其次，對學界提供研究訊息方面則為多方面的，尤其是不少書是罕見之書，或有研究價值者。舉例如「《翰院初編字學彙海》」（第 281 頁）著錄「光緒十五年北平秀文齋刻本」。此書為當時書肆糾集名人四十餘人（多為狀元）手書上版，此種名人手書上版之書較少為人注意。沈津在《伏櫪集》中〈以名人為寫工的金壺精萃〉（見第 355-361 頁）一篇有相當介紹；又筆者所知清末南京狀元閣刊《字學舉隅》即為晚清名人六位手書上版。這類多名人手書上版之書多為科舉時代售舉子的工具書，一方面提供讀者翻檢，另外一方面以中舉名人手書，亦有提供士子學習之意。

是書文末附書名、作者與書坊諸索引，更便於讀者檢索。

針對本書，筆者閱後略作校讀與建議如次：

第一，由於本書僅展示館藏線裝書目，加上又編有各專藏書目，限於時空因素，只能捨棄將同樣屬於普通本的專藏書目書籍列入，殊為可惜。但筆者仍建議，日後編輯出版史子集諸部普通本書目，除《館刊》連載以外，仍應將過去各專藏書籍以互見方式納入。蓋館藏善本與普通本線裝書目可代表館藏總清單。

第二，筆者核對過去所編的《普通本線裝書目》發現，除一部份歸入善本之林外，本《目》所見，不僅涵蓋其餘全部，另尚有新增。但仍有五書屬於漏網。筆者列之如下：

《周易古義》七卷二冊 楊樹達撰 民國十七年上海中華書局聚珍仿宋本。

筆者案，館藏檢索有兩部，其一為徐復觀舊藏（書號：HS A01.2 4643 另一則當為舊《目》所載者（書號：HB A01.2 4643）。

《詩緝》卅六卷八冊 宋嚴粲撰 復性書院刊本

筆者案，此本為民國卅七年復性書院刊本，然未見館藏檢索系統。

《古文字學導論》不分卷二冊 唐蘭編 民國廿四年北平唐氏影印本

筆者案，館藏有多部臺灣影印本平裝書，此本未見館藏檢索系統。舊《目》既是言「普通本線裝書」，應非一般平裝書。

《聲韻學表解》二卷二冊 劉頤（筆者案，當為「蹟」字）撰 抄本
筆者案，此書已入《善目新編》，但館藏檢索系統另有「民國廿三年印本」（書號：BOOK 802.24 7271）在一般書庫，未知是否為線裝書。

《名人楹聯大觀》不分卷四冊 掃葉山房編 民國十五年上海掃葉山房影印本

筆者案，此本見館藏檢索系統（書號：HB C08.22 (r)5742），舊《目》入經部有誤。

所謂漏網之書，實為整理館藏時，先據書目、卡片著錄，並逐一查核，但有時因諸多因素，如排架錯誤、或疏漏，造成有漏網。經部中，《聲韻學表解》或當從一般書區移入線裝書，《周易古義》當補入，《詩緝》、《古文字學導論》諸書當再查檢，是否仍存館中，以待日後再補入修訂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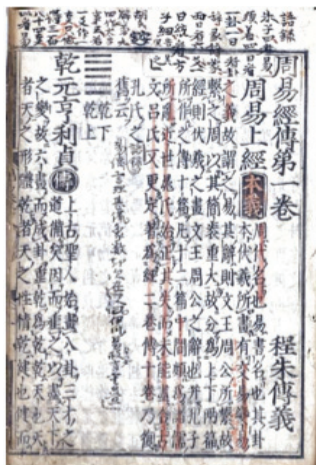
第三，版本更待釐訂，古籍判定上，在新技術或資料的出現，善本書有降為普通本，普通本亦有可能升級為善本。前者如館藏「《左傳句解》」、「《禮記集說》」、「《爾雅》」等書，均為清末南京狀元閣刊本。後者如「《周易經傳》廿四卷三冊」（第 5 頁），著錄「日本刊本」，似語焉未詳。

按，此書取用底本當是明嘉靖間閩刊黑口本，臺北故宮有藏。檢長澤規矩也《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錄》著錄是書較早的日本版本有「寬永二年京都中島久兵衛刊本四冊」、「寬永四年跋後印本八冊」、「後印本（無如竹跋）七冊」、「慶安四年京都八尾助左衛門翻寬永本八冊」等本³。日本年號「寬永」當中國天啓、崇禎間，慶安則當清順治間。第一種似未見館藏，「寬永四年跋後印本」則見日本國會圖書館藏⁴、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又《中國館藏和刻本漢籍書目》著錄大連、遼寧二館藏。「慶安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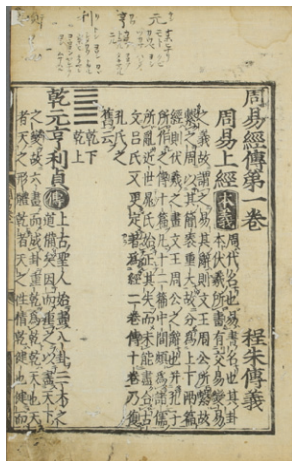
³ 以上諸本，筆者根據長澤氏《書目》而又有修訂。

⁴ 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本存卷 1-11 共四冊，該館著錄刊印時間「寬永年間」，與日本國會館核，知為同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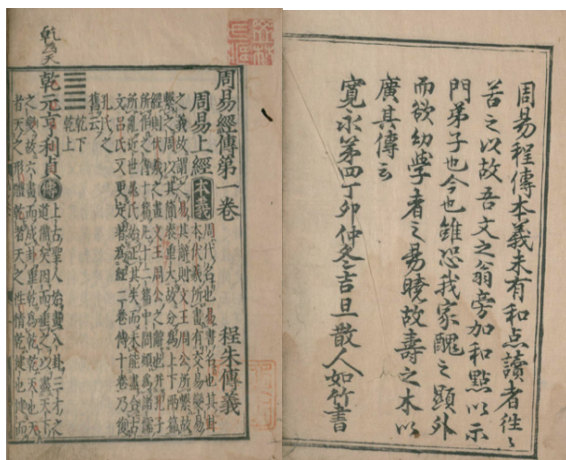
則見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有兩部⁵）、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以日國會館藏「寬永四年跋本」與館藏核對，確為同版，然館藏缺寬永四年如竹跋。又館藏共三冊，當經後人改裝。故此本可改訂為「日本寬永二年京都中島久兵衛刊後印本」，此本在日本也罕見館藏，當可改入善本之列。



東海館藏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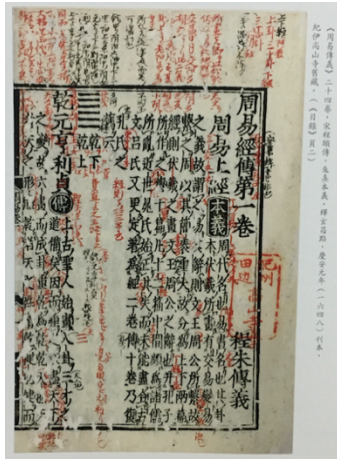


早稻田大學藏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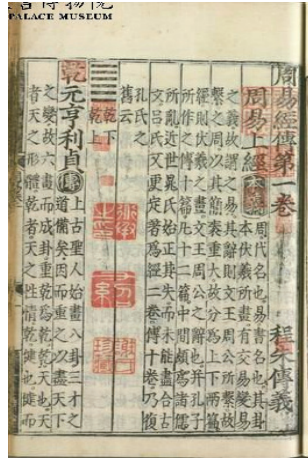


日國會館藏本

⁵ 此據張寶三編《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珍本東亞文獻目錄--日本漢籍篇》，又趙飛鵬撰〈傳播與回流—「和刻本」漢籍的淵源與價值〉（收入潘美月等編《東亞文獻資源研究論集》）一文末附〈國內「和刻本」經部漢籍目錄（初稿）〉則一列寬永四年，一列慶安元年。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本



臺北故宮藏明刊黑口本

(臺大本翻攝自張寶三編《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珍本東亞文獻目錄-日本漢籍篇》)

第四，關於版刻敘述方面，《書目》在版本項敘述或有未佳，如「《周易鄭康成注》」(第 1 頁)版本項作「四庫善本叢書本，臺北藝文印書館」，筆者以為不妨改作「民國四十八年臺灣藝文印書館據故宮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四庫善本叢書初編零種」。又如「《宋監本周易正義》」(第 3 頁)作「民國五十九年臺北藝文印書館據傅增湘藏宋本複製」，用「複製」不如用「景照」或「景印」，或如前例改作「民國五十九年臺北藝文印書館據傅增湘藏本影印四庫善本叢書零種」。其他此類情形頗多，不再一一贅述。

又「《易例大全》不分卷一冊」(第 14 頁)，著錄「清活字本」，扉葉文字題「精工刊刻」，再審其所附書影似非活字，應改「清咸豐年間刊本」。

又「《周易通論》四卷缺卷三存三冊」(第 13 頁)著錄「慎厥堂藏板，清刊本」，不妨改作「清中葉慎厥堂刊本」。

又「《(影宋本)尚書正義》廿卷廿冊」(第 29 頁)著錄「據日本弘化四年(1847,清道光廿七年)景宋刊本景行」，當改為「日本弘化四(1847)年熊本藩時習館翻足利學校藏宋越八行本」。此本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亦藏。

又「《詩毛氏傳疏》卅卷」(第 52 頁)著錄「清道光廿七年(1847)至咸豐九年(1859)吳門埽葉山莊陳氏藏版,武林愛日軒朱兆熊刊本」,似嫌拗口,不妨修訂為「清道光廿七年(1847)至咸豐九年(1859)吳門埽葉山莊陳氏刊本」。蓋乃陳氏委託武林朱兆熊愛日軒刊行。此書光緒時書版仍存,上海校經山房朱氏曾購得刷印權梓行販售。

又「《韓詩外傳》十卷」(第 61 頁)著錄「清光緒元年(1875)盱眙吳氏望三益齋刊本」。按,不少館藏皆如此著錄,但吳氏與望三益齋不是同一事,「望三益齋」為南京書肆,當改作「清光緒元(1875)年南京望三益齋刊本」。

又「《孟子集注箋正》十四卷」(第 142 頁)著錄「民國二十五年揚州簫聲館活字本」,稱「活字本」不如稱「鉛印本」精確。

又「《各經傳記小學》十四卷」(第 194 頁)著錄「民國廿四年影印本」,不妨改作「民國廿四年商務印書館石印本」。

又「《說文釋例》二十卷」(第 211 頁)著錄「道光十七(1837)年成都茹古書局刊本」,內文提及「茹古書局」,又其為同、光間書局,故當改為「清同治四年成都茹古書局刊本」。

又「《說文解字六書疏證》」(第 222 頁)著錄「民國四十六年科學出版社石印本」,當改為同年「北京科學出版社影印本」。

又「《周人經說》」(第 342 頁)著錄「清刊本」,實為「清同治吳縣潘氏功順堂叢書零種」。

又「《翰院初編字學彙海》」(第 281 頁)著錄「光緒十五年北平秀文齋刻本」。此書為時名人多人手書上版,或可改為「清光緒十五年北京秀文齋刊名人手書本」。

第五,其他考訂方面,如「《易經程傳》四卷四冊」(第 4 頁)著錄「清明善社刊本」,並言光緒間廣東有明善社刻《讀通鑑論》,未知是否同一家云。檢廣東明善社刻有不少圖書,除此外,別無同名書肆,其指廣東書肆應無誤。而據前人研究,明善社刻《易經程傳》頗多誤字。

又「《論語注》廿卷五冊」(第 134 頁)著錄「民國六年北平美使館刊本」。「北京」稱「北平」乃為民國十七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至中

共建政又改稱「北京」，故此當改回「北京」。又牌記稱康有為校刊於美使館美森院居幽時，版心下緣作「萬木草堂叢書」，以鄙見當改作「民國六年康氏刊本」。

又「《銅板四書集註》」（第 150 頁）著錄「民國元年上海廣益書局銅板印本」。核其書影，實為石印本，所稱「銅板」實有「正版」或「同版」之意。此詳拙撰〈從步月山房刊東周列國全志再談「銅版」一詞等同「同版」〉（《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 35 期，第 29-33 頁，2018 年 11 月）

又「《古經解勾沈》」（第 343 頁）著錄「清刊本」。筆者嘗考此書刊印情形，判定東海本同哈佛燕京本，為清乾隆末葉刻本，詳拙撰〈談余蕭客古經解鉤沈原刊與翻刻本〉（《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 42 期，第 51-59 頁，2019 年 6 月）。

第六，書目前符號使用不明，如「《儀禮喪服釋考》」（第 70 頁）前有「*」、「《禮記》廿卷六冊」（第 74 頁）前有「◇」，「《說文解字偏旁考》」（第 230 頁）前有「◎」，「《汗簡六卷》」（第 269 頁）前有「#」字等，根據謝鶯興老師指出，此為當初編輯時注記，以備參考之用，其後成書未加注意而保留於書中者。

第七，鈐印部分，著錄一書藏印應以書主藏印為主，若是序跋後以刻印方式呈現者，並非藏印，可不必著錄，如「《周易通論》四卷缺卷三存三冊」（第 13 頁）著錄有「松竹清風」一印，此為上杉憲實用印，非藏印。另外若是翻刻書籍，一併翻刻原書藏印亦非藏印，可不必著錄。

又所見藏印印主亦需儘量查明其人，如「《古韻通說》」（第 319 頁）鈐印「唐學齋」為日本漢學家吉川幸次郎所藏。「《白虎通疏證》」（第 352 頁）鈐印「書帶草堂藏本」、「吳興鄭宜輅章」，為浙江吳興藏書家。

另館藏印可不著錄，如「《群經述要》」（第 353 頁）著錄鈐印「無」，然有「東海大學藏書」一印。又「《易經程傳》」（第 4 頁）則列東海藏印二枚，於體例又有不合。

館藏普通本書目經部的完成，筆者仍期待史部、子部與集部諸部的完成與付梓，也期待臺灣其他圖書館古籍書目（或書志）的整理與修訂。（附記：本文初稿曾請謝鶯興老師過目指正，今又據以修改，特此謝忱）